



中国传统文化 与现代化

海南出版社

中共海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 编
中共海南大学委员会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共海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 编
中共海南大学委员会

琼新登字 04 号

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

中共海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
中共海南大学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武 铠

责任校对：梁筱玲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海南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海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字数：27 万

199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5613 册

ISBN7—80590—293—3/G·183 定价：11.80 元

序

王厚宏

为了在高等院校中开展爱国主义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适应海南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急需，海南省高校工委与海南大学党委在多年准备的基础上，组织一批专家学者编写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一书。该书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保持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出发，以增强青年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豪感为目的，分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传统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经济理论、传统文化与市场经济、传统文化与企业文化、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传统文化与海南琼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等十余个专题进行了研究。全书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教育学、文学、史学、哲学等，充分体现了文化研究的跨学科性特点。全书视野开阔，论点新颖，实例生动，文笔流畅，将历史的眼光与现实的分析相结合，把理论的研究与实践的观点相统一，既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专题研究的集萃，又是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好教材。

我相信，该书的出版将有助于我省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广大教师以及青年学生的思想素质的提高。同时，对我省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书的出版一定会受到我省高校师生的欢迎。

目 录

序	王厚宏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起源	叶舒宪	(1)
一、传统文化问题的缘起		(1)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5)
三、中国文化之根		(10)
第二章 传统文化与人的现代化	李昌邦	(17)
一、传统文化对人的现代化之现代价值		(18)
二、现实价值之一：理想人格与集体取向		(21)
三、现实价值之二：自我修养与中庸之道		(26)
四、现实价值之三：学习模式与治学态度		(31)
第三章 传统文化与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尹双增	(36)
一、领先世界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36)
二、落后世人的近代科学技术		(38)
三、坎坷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		(40)
第四章 传统文化与爱国主义精神	李 俊	(45)
一、传统爱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与历史内容		(45)
二、传统爱国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53)
三、新时期的爱国主义		(56)
第五章 传统文化与道德自律	钱伟量	(59)
一、道德与道德自律		(59)
二、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自律观		(65)
三、传统道德观念的瓦解与新道德文明的建设		(71)
第六章 传统文化与廉政建设	谭世贵	(81)
一、“万恶贪为首”，“不贪为宝”		(81)

二、肃贪倡廉，惩腐兴邦	(82)
三、“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97)
四、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大力推进廉政建设	(100)
第七章 传统文化与政治文化	庞京城 (110)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	(110)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产生的根源	(119)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	(125)
第八章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	王毅武 (132)
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经济理论	(132)
二、传统文化中的商品、货币、市场思想	(137)
三、传统文化对中国现代经济理论的影响	(150)
第九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市场经济	王志芳 肖文旺 (153)
一、儒家的经济管理思想	(154)
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儒家经济伦理的冲击	(160)
三、儒家经济思想的现代意义	(164)
第十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	赵康太 (169)
一、中国现代企业文化的生长点	(169)
二、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共通性	(172)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文化的冲突性	(180)
四、中国现代企业文化向传统文化借鉴之必要性	(186)
第十一章 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化	周伟民 (188)
一、孔子的义利观、富贵观和货殖观	(188)
二、孔子的商业观念在现代商业文化中的价值	(195)
第十二章 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校园文化	陆志远 (202)
一、文化、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基本含义	(202)
二、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的互动关系	(211)
三、社会主义校园文化的发展取向	(225)

第十三章 传统文化与海南琼剧文化	唐 夫 (238)
一、中国戏曲文化与琼剧的起源	(238)
二、道教文化与琼剧的形成和发展	(245)
三、儒家思想与琼剧的衍变和繁荣	(252)
四、20 世纪新文化与琼剧的改革	(258)
第十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命运	陈封椿 (271)
一、人们关注传统文化问题的缘起	(271)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	(272)
三、需要制定与经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思想文化战略	(283)
论点摘编:	
1. 浅论“贞”与“柔”的现代转化	王齐冰 (285)
2. 道家的生命哲学	郑小枚 (293)
3. 老子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王鹏程 (298)
4. 儒家管理的现代价值	范海玲 (301)
5. “孝”的价值、局限与功能	陈川雄 (303)
6.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概说	姚定楷 陈宇锋 (308)
7. 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与学校教育	王晓梅 (313)
8. 传统文化对现代法制的影响	蔡鹤龄 宁清同 (315)
9. 儒家道德思想与现代道德继承	邓名载 (320)
10. 新加坡的国民价值观与中国现代价值体系的构建	张君玉 (327)
11. 文化传统与现实生活	蔡春为 (329)
12. 中国传统医学道德的发展道路	蒲万熊 (331)
13. 在青少年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的思考 ...	王 贤 (335)
后记	(338)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及其起源

叶舒宪

一、传统文化问题的缘起

这里所说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或“中国文化”的代称。所有这些合成词组或合成概念的出现都是近百年以来的新生事物，因为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并不存在“中国文化”或“传统文化”这样的说法。

作为人类学概念的“传统文化”是英文中 Traditional Culture 一词的汉译，它的原义是“保持在某种文化群体内本来流传下来的文化”。所有的文化都有“传统”的成分，愈原始的文化其传统性愈强。在与新的文化相冲突时，便更容易显露其传统性。^①与“传统文化”相对而言的是“外来文化”或“现代化”。可以说，近代中国知识界之所以兴起探讨传统文化问题的热潮，并且潮起潮落，历久而不衰，正是因面对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的冲击而在本土产生的必然反应。这种反应的激烈程度又同对外开放的程度和文化变革的程度成正比例。

换句话说，传统文化是某一社会的成员所接受的所遵从的一整套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总和。它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和传承已经被确认为是正当的、天经地义的、无需讨论和争议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提出和讨论“传统文化”的原因所在。而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之下，固有

①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第十册《人类学》，第 241 页；《中国文化辞典》，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7 年，第 6 页。

的传统发生动摇之日，人们怀疑传统是否具有永恒的合理性之时，传统文化才会作为一个问题而出现并且成为争议的焦点。所以说，传统文化问题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之下的必然产物。中华文明史中虽曾多次发生外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封建统治的局面，但文化传统却未曾中断，反而能将灭汉人政权的周边少数民族逐步同化，使之成为地理上的征服者和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这就充分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同化力，也无形中助长了中国人以自身文化为本位的优越感和自大幻想。只有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这种自我封闭的大门时，有识之士才意识到一场前所未有的“天地大变局”：军事的侵略、经济的渗透、政治的干预、宗教的传播、思想观念上的挑战……所有这一切引发出空前的文化危机：这不只是民族兴亡国家命运的问题，也是 5000 年文化传统何去何从、是绝是续的问题。

伴随着这种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危机感，向来自大自傲的国人中又轻易出现了另一极的情绪化反应：自卑自馁，用现在的话叫做“民族虚无主义”。潘光旦先生在《民族性格与民族卫生》一书中对这种由自大到自卑的两极化反应有绝好的说明：

在以前，我们武力上尽管不如人，尽管不敢抬头，在心理上还勉强的可以自己慰藉，就是，我们的文化高人一等，只要年代一多，不怕不能把别人吞并同化。这种自慰事实上总算也没有落空。但西化东渐以后，情形便大非昔比，和人家几番较量的结果，我们发现不但武力不如人，文化的能不能终操胜算，也就成了问题。于是于实际的虚弱之上，又加添了一种精神上的自馁。目前民族最大的危险，就是这种自馁的心理。

时至今日，这种心理仍然时常有所表现。

从 19 世纪末到“五四”以后，中西文化优劣之争波澜起伏，

大体上可分为两种对立的倾向：一方面是认定中国传统文化穷途末路，已成为走向现代化途中的最大障碍，必须从根本上革除。从世纪初的全盘西化论、“五四”时的激进反传统论到 6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乃至 80 年代的“黄色文明”让位于“蔚蓝色文明”之说，都可视为这种倾向的突出例子。另一方面则是奋力维护传统文化，认为西方文化不符合我国国情，破坏了传统的道德秩序和价值规范，不应作为未来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样板。清代末年的“自强保种”论和“五四”前后形形色色的国粹主义、国故运动，乃至今日海内外华人圈中热闹非凡的祭孔崇儒现象和民间宗教迷信的复兴现象，均与这一倾向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在面对传统文化的这种两极对立态度之间，当然还有形式各异、程度有别的种种调和论和折中倾向，在此不一一细数。总结这段文化争论的历史似乎还为时过早，但从中引出某些经验教训，以利于文化问题的深入和发展还是切实可行的。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无论是激进反传统主义还是文化保守主义都带有强烈的情绪化倾向，这也是变革时代初起在知识分子圈子中所引发的心理振撼作用的产物，使他们在新与旧、中与西的文化冲突之中难以保持冷静、以心平气和的态度去考虑问题，难免走向偏狭的极端，这本身就有违于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如余英时所说：“由于近百年来知识界在思想上的分歧和混乱，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一直没有机会获得有系统、有意识的现代清理。情绪纠结掩盖了理性思考：不是主张用‘西方文化’来打倒‘中国传统’，便是主张用‘中国传统’来抗拒‘西方文化’。中国学术思想界当然并不是没有理性清澈而胸襟开阔之士，只是他们的声音本已十分微弱，在上述两种吼声激荡之下更是完全听不见了。”^① 此种情况只是到了今日，方有了根本改观的迹象。

^① 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46 页。

8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空前进展举世瞩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进程同后冷战时期世界格局日益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同步发展，而且相互吻合。西方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以来在文化上出现了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价值危机，不少知识界精英人士对技术至上、物质财富膨胀而精神萎靡不振的西方文明持批判态度，转而向生命力持久的东方古老文化寻求足以引导新一轮全球文化发展的契机和动力。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认为，在过去500年间，由于西欧诸民族将其活动范围扩展到了全球，结果出现了技术上的统一。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将面对政治与精神上的统一问题，而西方文明在这方面已不能再充当主导性力量。有条件和潜力承担这一时代重任的将是中华民族。因为中国文化在过去2000多年来一直是在政治上把数以亿计各族人民统一为一个整体的^①。与西方知识界的这种厚望相应，在我国以及海外华人世界中也再度掀起了传统文化复兴的热潮。所不同的是，这一次带有总体性文化寻根和文化反思倾向的热潮并不简单地沦为对抗现代化和西化的复古运动，而是出于现代化和世界化的现实需要自觉地回溯传统以觅求充分的养料和实际的潜能。

正因为如此，当今先锋学者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审视传统文化的眼光均已同“五四”时期的复古派有了明显的不同。如果说当年流行的口号是“昌明国粹”和“尊孔读经”一类偏激保守之声的话，那么今日最有号召力的说法则是“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化”。在诸如此类的提法背后，是情绪化对立的消解和理性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的展开。中西文化孰优孰劣和何取何舍一类的主观价值纷争已逐渐让位于对跨文化考察的客观性认识的追求，以及对构成文化内的结构（社会——文化结构和

^① 汤因比等：《展望21世纪》，中译本，第1—2页。

文化——心理结构)和模式(语言——思维模式和认知——行为模式)的深层次探讨。在此基础上借鉴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有关“文化变迁”的理论成果,形成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新研究热点。在立场、方法、理论诸方面也逐渐走向与国际学术相接轨的方向。

可以预期,20世纪中国思想界几起几落的文化热及其所关注的传统文化问题并未结束,而仅仅是一个开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速,文化对话与文化融合的新时代已揭开序幕,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历史性课题仍将在21世纪继续成为知识界的热点,并不断引向认识的深化。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对中国文化特质的认识不能局限在中国文化范围之内,而首先应把它放置到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从古代文明发源发生的时空对比中确认它的相对位置和独特价值所在。

1、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位置

人类学的认识表明,每一个民族在其原始阶段或早期阶段,都难免产生这样一种自我意识上的错觉,以为本族人所生存的地区乃是世界的主体和中心,本民族文化在价值上优于其它民族的文化。人类学上称此种幼稚的认识为“我族中心主义”,它是在文化交往有限、认识水准低下时期自发的,普遍的现象。华夏文明这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文明自然未能例外。“中国”一名的由来便是这种文化错觉的语言明证。商、周以来的皇帝在建立国家时首先要做“辨方正位”、“以求地中”的工作,以便使自己的政治文化中心——都城与世界观上的地理中心相吻合,以此作为确立统治权力的宇宙论证明。历代皇帝相沿用的“明堂”制度,也是试图借助于自我中心错觉来强化皇权的表现。

夏、商、周三代皆兴起于黄河中游地区,这就逐渐形成了以

黄土高原地区为中心的华夏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依然保留在所谓东、西、南、北、中五岳的划分命名上。处在居中地区的汉族人将四边以外的诸少数民族视为文化低劣的异族，故有史书中“东夷”、“南蛮”、“西戎”、“北狄”一类带有强烈种族歧视色彩的蔑称。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儒家创始人特别强调的“夷夏之防”和“用夏变夷”，特别推崇的“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都是此种我族中心世界观所衍化出的文化沙文主义态度。

我族中心错觉不仅体现在空间位置的优越感方面，而且也体现在时间向度的历史观上。儒家的“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就是要在起源上追溯文化正统，在思想上确认嫡亲之根脉的做法，与此相应的则是把华夏以外的文化视为没有历史的异端支系，有待于被悠久而长远华夏文明所教化和同化。

近代中西文化的对话彻底打破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信守不移的“天下之中”的观念，借助于现代考古学的发现，四大文明发祥地及其发生的时间序列已基本明确，这就使我们有可能重新确认华夏文明的坐标位置。

从空间分布看，四大文明古国分别产生在西亚、北非、南亚和东亚的大河流域，即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印度文明和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尽管四大文明之间也存在一些跨地区的文化交往和相互影响，但从语言文字到思想制度，从物质生活到风俗习惯，它们毕竟都有根本的不同之处，因而可以确信是相对独立地产生在世界的这四个地区的。由此可知，在地理空间上，四大文明之间并无“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也不存在判别优劣高下的统一尺度。

以时间分布而论，四大文明却可以按照发生的年代排列出先后的顺序，上一世纪人们公认的最古老的文明是埃及，其次为巴比伦。本世纪的考古发现改变了这一次序，世界上最先出现的城邦文明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国家。如果按照有无文字作为文明与

原始的判别标准，那么，苏美尔人首创楔形文字的年代早在公元前 4000 至 3500 年间。过去被公认为是世界第二个文明古国的巴比伦，只是在公元前 2000 年左右征服了苏美尔城邦，又继承了其文字和文化的后起国家。仅次于苏美尔文明的是古埃及文明，其象形文字产生的时间约为公元前 3500 至 3000 年。排在第三位的文明应是印度，本世纪 20 年代以来在印度河流域发掘出的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巴两个城市遗址，其年代测定为公元前 2200 至 2000 年，比传说中的中国夏代（公元前 21 世纪）略早，而且该城市布局之严整，建筑规模之宏大，比苏美尔城市毫不逊色。中国文明史历来号称五千年，但夏代文字迄今未有系统的发现，较确凿可信的商代甲骨文字出现在公元前 1700 年，故殷商以前的历史尚带有神话传说的性质，不宜看作文明史的开始。

尽管从时间排序上华夏文明位于四大古国之末，但是从时间延续上看却又足以充当生命最持久的一个，而且几乎是唯一的一个。苏美尔文明早在公元前 2500 至 2000 年间先后被阿卡德人和巴比伦人的游牧文化所灭亡；埃及文明也在上古便告寿终正寝，存留至今的只剩下供游人观光的大金字塔群和供文人凭吊的帝王陵墓。面对此景，一种“而今安在”的兴亡之感慨不免油然而起。文明古国中真正称得上“源远流长”的只有印度和中国。相形之间，印度文化在近代因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而有所中断，唯一幸存至今而未曾中断传统的古文明仅有中国一个。这一事实是从世界总体上观照中国文化所获得的第一特质，也是汤因比等西方思想家为未来的全球统一前景物色主导性的文化生命力时垂青于中国的根本原因。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这部巨著不仅纵横比较了四大文明古国的兴衰经验，而且将世界上所有主要的后起文明总计 25 种均纳入了考察的视野，如此而得出的论点自然有其充分的依据，不能视为主观好恶的随意性见解。

中华文化何以具有如此特殊的生命活力，在历经了自然的挑

战和外族入侵的长久考验之后依然能够顽强存续？为了理解这一疑难问题，有必要弄清它在文化结构、人格结构和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质所在，并且进而追索这一文化传统在其形成期某些特殊因素的作用。

2、传统文化的主要特性

文化是一个整体，整体之中包含着社会、宗教、艺术、道德、政治、科学、民俗等等各个层面的内容。各个层面在每一种文化中均有相异的表现形式，而尤其重要的则是各个层面在文化总体之中的相互关系，正是这种相互关系的不同构成了文化结构上的差异以及由此而派生出的民族性格上的差异。大体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在结构上的根本差别在于，西方偏重于宗教与科学，表现为普遍的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理性的精神所构成的对立和张力；中国偏重于道德与艺术，表现为发达的人伦体系和人格修养要求（儒家），还有直觉性体验性的艺术审美人生观（道家）。宗教与科学在中国文化总体中均不占主导地位，佛教与道教从来无法同政治伦理性的儒家思想争正统。

社会结构上以宗法制家族为本是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质。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其土壤，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的存在几千年间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自西周时代开始，宗法制体现为自天子至诸侯、卿大夫、士的金字塔式纵向关系，经过春秋战国的变革，到了秦汉以后的封建国家中，又体现为以家族为单位的横向网络关系。因此，历来的统治者总是竭力维护这种宗法制度，在家族中倡导孝，在家族的放大形式——宗法国家中则倡导忠，以此作为稳定人际关系，巩固社会等级秩序的重要手段。作为封建人伦大宪法的“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意思是说君对臣，父对子、夫对妻都同样具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反过来则只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三纲中作为原型的关系是父子和夫妇，君臣关系是类比派生出的。父子关系是父权制社会中最基本、最

直接的血缘单位，也是培养孝子忠臣的最初级、最有效的场合。中国文化为反对父亲的儿子设立了一大罪恶之名——“逆”，因为只有符合三纲的言论行为才是“顺”；还为危害父亲生命的行为专门定下一个九死不赦的罪名——“弑”，这种情形在其它文化中是十分罕见的。无论是“逆”还是“弑”，都可按照宗法国家的类推逻辑引申到臣对君的关系上，于是与“逆子”对应的是“逆臣”，与“弑父”对应的是“弑君”。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特有词汇和类比逻辑都充分表明了这个社会结构上的血缘关系本位特色。

传统文化中的血缘关系内部也还有亲疏远近的种种细部分，由此而派生出异常繁复的亲属称谓系统，同其它文明古国相对照，亦显得非常突出。大致而言，血缘关系之亲疏主要体现为血亲与姻亲的区别，包含父族，母族和妻族，但以父族为主，用姓氏作为标记来组合同父共祖的人群。具体地讲，同父的人自然属于同一个家庭，而共祖的人则属于同一个家族。在家族社会之上的政治单位是国家，个人与国家之间由于有家族作为中介而调和起来。国家之名原来就是效法“家”而创设的。属于同一国的民众在某处意义上也相当于同一个放大的家族。至今国人仍然以“炎黄子孙”相称和自称，这也是宗法家族观念在语言习惯上的反映。

比血缘关系次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是地缘关系，具体地讲就是邻里乡党。它在传统文化中虽不像血缘关系那样重要和关键，但也比其它文明更为讲究，以至祖籍同乡意识至今仍在维系人际关系方面起到一定作用。同乡即可称“乡亲”，这一称呼也体现了由血缘向地缘的类比推论。

在思维方式上，以象为主的直观理性思维是传统文化的又一特质，并同西方式的抽象概念思维形成鲜明对照。从《周易》的观物取象和因象设教式的意义表达，到儒家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比兴类比式推理，奠定了华夏思维方式的具象性和类比

性特征。加上道家所激赏的“得意忘言”式的体悟性直觉理性，更加重了这一方面的特化发展。^①

在人格建构上的中庸理想和儒道均衡，详见第二章。

三、中国文化之根

文化特质是历史过程的产物。对于文化传统形成给予决定性影响的要素便是史前文化的奠基和文明的发生。正如启蒙思想家所信奉的格言所说：懂得了起源就懂得了本质。

对传统文化之起源做追溯性的考察，无疑会大大加深我们对文化特质的理解。

在探讨世界文明发生原因方面，历史学家倾向于一元说，即自然环境的挑战和人的应战促使文明在主要的大河流域地区不谋而合地产生。农耕文化是所有文明的基础，四大文明之所以都发源于大河流域，是因为那里的水源条件使大规模的灌溉农业成为可能。只有在大规模集约化的农业生产要求下，才会有超越原始古朴状态的发达的社会组织形式，为城市的产生提供条件。

于是，人们习惯于说埃及文明是尼罗河之子，中国文明是黄河之子，然而，这种一般化的类比恰恰遮蔽了华夏文明诞生的特殊性。

当代考古发掘表明，中国新石器时代农耕居民对居处的选择大都不在黄河沿岸，而在远离黄河的一些支流和支流的支流边的高地上。例如位于关中平原上泾河岸边的西安半坡原始村落遗址，以及类似的新石器时期遗址等。

过去的西方学者常将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流域文明的经验硬套过来，推论中国农耕文明的发生也是克服黄河水患并发展灌溉的结果。

^① 详见拙作《言意之间：从语言观看中西文化》，《陕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3期。